

我的家在鲁南,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,也是抗日“神兵”运河支队的故乡。

小时候家乡最耀眼的庄稼是高粱,一到秋后,村的四周被一片片红彤彤的高粱包围。后来大队为了增加粮食的多样化,开始种玉米、地瓜、大豆、谷子……那年高粱红的季节,大队开始刨高粱,从山旁到村边,男劳力只管刨,女同志在后边收拾高粱头,高粱秸要一个个两头捆好,晾晒完了是可以卖的,或者留着盖屋当秋秸把用。

几天过后,刨到村前头一块“三岔河”的高粱地,那片地土质肥沃,高粱秆粗壮,高粱也饱满。不过老百姓关心的,是村东大群的野兔子都集聚到这里,因为别的地块已经容不下它们藏身,这里三面环水,去干活的必定能有收获。

队长点完名,社员干起活来。地里能看到野兔紧张地东奔西跑,有的开始向外面的人群冲刺。那时我还光着屁股,指着野兔,“这里,那里”地高喊。野兔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,四散而逃,社员暂时放下手里的活在兔子后面追逐,很多很多的野兔逃之夭夭,我只是跟着兔子后边起哄。晚上回家的路上,大家都在谈论和野兔奇遇的那一瞬间,也有人骄傲地举起手中的兔子,大声讲着抓兔子的经历。王二麻子更是骄傲地说:怎么那么巧,兔子从我身边跑过,我不慌不忙只一镰刀过去,野兔便应声而倒……几只野兔丰富了餐桌,也在饭后增加了几多笑谈。

我初中毕业,责任田已经承包了几年;家乡的种植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高粱不再是生活的主食,而成为方便生活的附属用品,为了能刷秋、编扫帚,家家还是要种植的。我初次拿起锄头,开始耪玉米高粱。父亲说,这锄,是你爷爷留下的唯一财产。我拿起爷爷使过的锄,知道了高粱是怎么耪的,左一锄右一锄,耪得高粱翻跟头,高粱是需要晒根的,看着高粱锄掉了,只要还有一条根连着,这棵高粱就能茁壮成长,只要耪好高粱的幼苗,总能看到九九高粱红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,每一年耪地的季节我都离不开那把锄,锄是一把普通的铁锄,我成家后,它成为母亲分给我的家产。锄头不大,正好用于锄高粱、芝麻类作物。听老人说,爷爷是耪高粱地的高手。拿起锄,更让人想起爷爷,想起村四周曾经高粱飘香的时代。

听说,爷爷没有一分地,冬天做点小生意,春天一过高粱发芽,爷爷就靠他那把锄吃饭了。爷爷会拿着那把锄到集市上,在卖苦力的地方



【故地往事】

九九高粱红

□张平

一站,地主的管家早早地等着他,领到高粱地边,用手一指,这些那些,高粱榜倒杂草锄净,晚上管家验罢,看到笑脸,爷爷才能拿到一天的工钱。

鲁南算是江北,就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,有了大半年的青纱帐给小村做屏障,很远很远都看不到家的矮墙土屋。在那个冬雪覆盖、饥寒交迫的严冬,屋漏墙塌,难以容身的爷爷忍无可忍,加入了运河支队,跟随部队转战在运河两岸,打鬼子除汉奸。

运河支队是抗日战争中活跃在苏鲁边界、运河两岸的一支著名抗日武装,创建于1940年1月,由罗荣桓政委亲自命名。一直到我初二才知道,爷爷是一名烈士,牺牲在台儿庄区南洛村一块高粱地边的水沟里。

爷爷知道高粱地能藏龙卧虎,要想家乡安宁,不能做缩头乌龟,得敢于走出来和敌人斗,刀对刀枪对枪。一次激烈的战斗中,爷爷负了重伤不幸被俘。听说那年刚收完高粱,爷爷被反绑着双臂,敌人把他推出村外,站在光秃秃的田野旁,默默看着家乡,破烂的棉衣撑起一副坚强的身板;枪响了,爷爷像山一样轰然倒

在田边的深沟里……没有人收尸,几天后还是一位好心的村民就地用土把爷爷掩埋,不让英雄暴露尸骨……

1984年的清明,一天的倾盆大雨,爷爷的忠骨回归故里。父亲跪在爷爷的棺柩前,任凭高粱撒了三遍,也止不住那悲痛的泪珠儿……雨过天晴,春暖花开,爷爷的坟茔上长出了密密的高粱幼苗,没有谁去管理它茂盛的秸秆,几乎遮挡了前面的烈士碑。在微风的吹拂下,匍匐摇摆,犹如指向前进的号角。一直到秋后,高粱红了整个坟头,也没有谁去碰那高粱红,任由天空的鸟儿采食或又撒回大地。我们年年都给烈士爷爷扫墓,坟茔上总有高粱出现。

现在,家乡见不到高粱红了;生活快节奏的今天,什么省事种什么,一季小麦接下来一季玉米,都是机播机收,早已不见高粱的踪迹。

后来,高粱在爷爷坟茔上消失了。一年清明我跟父亲给爷爷扫墓,临走,父亲在挎包掏出一小把高粱种跟我们说,以后年年清明扫墓都要在爷爷的坟茔上种上点高粱。

到了秋天,再去爷爷的坟茔,远远看到一棵棵红高粱,像爷爷那杆战斗的枪,屹立在烈士身边。

【老照片】

“记者梦”的种子

□冉庆亮

记者节快要到了,我又翻看自己的这张照片,我称其为“记者梦”的种子。

1977年初,是我在驻陕西省潼关县部队当汽车兵的第三个年头。我利用业余时间,趴在铺板上学写新闻报道。可忙活了大半年,发出的几十篇稿子都泥牛入海无消息。有战友对我冷嘲热讽,我一气之下,洗手不干了。九月份的一个星期天,班长突然要我陪他去照相馆照相。谁料,他不照,只安排我坐下照。他说,你趴铺板构思那个姿势很“迷人”,就照张构思写稿的照片吧。

回军营的路上,他对我说,看得出,你很想当记者。我脸红了一下没吭声。他说,知道你这段日子为稿子上不了报而苦恼,我看你行,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别管别人说什么,认准的路,就要坚韧不拔地走下去,千万别泄气啊!他还列举当地的贾平凹,从一个农村娃成为知名作家的实例,循循善诱,鼓励我一定要坚持“构思”写下去。我重新振作起来,利用白天出车间隙采访,晚间写稿。

两个月后,我写的《解放军义务帮助地方修汽车》《覃助理员退款》《爱护树木人人有责》等几篇新闻稿先后被《陕西日报》《西安日报》《人民军队报》和电台播发。之后,我一如既往,边勤奋工作,边积极采访写稿,每当我遇到困难和迷茫,总拿出这张照片看了又看,反复回味班长的教导,一切困难和迷茫便迎刃而解。以后在部队的三年中,我所写消息、通讯不断被地方、军队媒体采用。

1981年退伍后,我手持团里开具的荐贤信找到县委宣传部求职,被挡回。我再次看我的“构思照”,又信心百倍。从每月20元工薪的公社临时通讯员做起,坚持“八年抗战”,笔耕不辍,终于成为县广播电视台一名优秀编辑、记者。同时,我潜心学习文学创作知识,写的百余篇小说、散文被报刊刊登。



【民间忆旧】

老烟台盔头匠

□毛贤君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日军侵占烟台前夕,烟台的手工业十分发达。众多的手工艺人,虽文化程度低,但在技术上精益求精,老半半堂戏装盔头店的盔头匠人就是这样能工巧匠。

“老半半堂”原来只是个药铺的名称,取“半积公德半济世”之意。创始人曲福厚先生是黄县(现龙口市)下观傅家村人,酷爱京剧,偶尔也会粉墨登场,算是资深“票友”。他手特别巧,什么营生一看就会。最初是为了省钱,务农闲暇时,做些演戏用的服装道具自娱自乐。后来做多了就拿到集市上卖,并访师求友,不断地学习深造。

戏曲演员演戏时戴的帽子统称“盔头”,因为剧种不同,盔头的式样也是花样繁多。有的名角还会自出盔头式样,花色更加繁杂,如昭君盔、蝴蝶盔、萧何盔,俗称改良盔头。盔头工艺复杂,制作技术难度很大,主要工序包括摹样、捻条、捏条、抓胎、上胶、上漆、贴金、点翠等15道,此外还有做绒球、搓发、上珠穗等辅助工序。

民国初年,曲福厚在烟台天仙戏院西侧(后为“福禄寿”影院)租了两间门头房,开起了“老半半堂”戏装盔头店,主要制作戏装、道具。1931年,因业务不断扩展,店面迁到了儒林街61号,产品不仅畅销胶东各地,还远销唐山、大连、沈阳、哈尔滨等地。当时北京、上海的盔头店都是从其他手工作坊买回绒球、珠穗做配套,而“老半半堂”除珠子不能生产外,其余全是自己手工制作。行里人一提到老半半堂家出品的戏装盔头,那可谓“窗户眼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”。“老半半堂”不仅为烟台的戏班添制行头,还曾为来烟台的尚小云、金少山、张少甫、高百岁等京剧名角添配戏装、盔头、道具和刀枪把子。后来,“老半半堂”还到青岛、潍坊开过分号,成为山东最大的戏装店。直到1958年3月,曲家一家11口人加入了烟台戏衣锦旗合作社,从此“老半半堂”这家老字号不复存在。

“老半半堂”起初做绒球只能做一种颜色,可顾客要求带花色的甚至是太极图案的绒球,这可让店里的工匠犯了难。须知当年学手艺不容易,手艺人有句话说“能帮五吊钱,不帮一句言”。这“一句言”就是技术的窍门,有绝活的人只教儿子,不教女儿和女婿。因为艺不外传,在本地学不到,所以只好去外地偷艺了。为攻克技术难关,“老半半堂”曾派工匠两次到北京,三次到上海去“偷艺”,回来才掌握了做绒球的技艺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来烟演出,“老半半堂”为他制作了祭孔古典舞蹈中用的翎剑、鹤鹿及牌穗子等细小道具。尚先生演出时对道具很满意,高兴地说:“没想到在烟台这小地方,也会有人做出这种不常用的道具(指翎剑),而且做得这么好。”并把自己的照片,亲笔签名盖章,赠给“老半半堂”做纪念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写回忆文章时,问曲长运先生能否找到尚小云的照片,曲师傅说他保存多年,可后来在“文革”中辗转流失,不由让人感叹唏嘘。

1961年秋,我在盔头车间干临时工,看长运、长洲、喜彬曲氏三个亲叔伯兄弟做盔头,真是艺术享受。做盔头先要画出样子,这三人都有绘画天赋,只见他们手执饱蘸墨汁的毛笔,信手拈来,落笔成趣,旧报纸上就出现了龙、凤、云彩、日出、海浪等动物或风景。然后,把四层浅黄色的马粪纸叠在一起(老烟台人土语称为纸背子),把样子铺在上面,放在特制铺有软泥的小盘子上,用刻刀刻出来。刻时要有技术,这4张马粪纸展现的图案才能分毫不差。然后把铁丝抻直,按一定的长度截开,缠上筋道又柔韧的纸张(行话叫条子),加湿化好胶,再用钳子和条子粘在马粪纸上,一个盔头的雏形就出来了。

等到上了色、描金点翠之后,你再看那盔头:皇帝戴的皇冠美轮美奂、金光闪闪,娘娘戴的凤冠朱环翠绕,雍容大气,小贪官戴的帽翅摇摇晃晃,还有武将戴的威风凛凛、仪表堂堂的大额子、小额子……盔头多达百多种,谁能想到都是曲家能人用废报纸、马粪纸、铁丝这些廉价不起眼的材料做的呢。